

戈德巴乔夫



通往权力之路

【联邦德国】科里斯丁·施米特·霍尔
邹明 刘海涛 郭强译



沈阳出版社

戈 尔 巴 乔 夫 —通往权力之路

【联邦德国】科里斯丁·施米特·霍尔
邹 明 刘海涛 郭强 译

沈 阳 出 版 社

1988年·沈阳

责任编辑：赵敏

封面设计：邱连润

责任校对：李瑶

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

(联邦德国)科里斯丁·施米特 著

邹明 刘海涛 郭强译 黄相荣 校译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50,000

印张：7 插页：1 印数：1-20,35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17-0/D·15 定价：1.95元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战略走向

——代译序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顿时引发了国内的活跃空气，并引起了国际性的瞩目。作为当代一个大国的主要领导人，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冲破停滞中的苏联，震惊着转化中的大千世界，并颇有问鼎“世界大脑”之势，这是十分罕见的。伴随着这一强劲的风潮而来的，是国际公众急需了解戈尔巴乔夫，一批有关的论著应运而生，而《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一书则令这块引人瞩目的园地锦上添花。

该书是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的一部传记著作。作者科里斯丁·施米特·霍尔曾任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周刊《时代》杂志常驻莫斯科记者，与苏联几届领导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并与戈尔巴乔夫有直接交往。他在苏联体察了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的进程，凭借记者的独特洞察力和精细的文笔，从一个特有的角度描述了他作为政治家捕寻苏联权柄的轨迹及其新思维的精髓，也颇为细腻地描绘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平凡生活，以及夫人赖莎对其事业的内在影响。该书在结构性的布局上可谓纵横大交叉，远溯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大略，近及赫鲁晓夫开掘苏联的改革潜流，深入开掘在新旧交叉点上改革

与守旧的抗争，全面展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苏美战略抗衡。纵向如涓涓细流汇成今日改革之潮，横向如滔滔江水积淀成当代航程之礁——形象而逼真地描绘了苏联之路——充满荆棘，走向希望。这是该书对戈尔巴乔夫研究的独家性贡献。

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改天换地的革命，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世界，至今，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命运依然牵荡人心。

在20世纪，苏联出现了和将面临着两次大转折。十月革命以马列主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民主的广阔道路，这是世界历史上颇具创意的尖端思想大作。这是第一次大转折的核心要素。第二次大转折将是苏联的全面和根本性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其核心是激发人们最开阔的创造力空间，开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前者是“硬件”革命，后者是“软件”革命；前者是根本性的突破，后者是关键性的变革。

十月革命胜利的一个划时代成果，就是执政党把往昔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扩展到整个国家系统。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要求集中与民主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统一与自由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集中与分散是个“双轮运转”系统，以分散求活力，以集中求控制，关键在于求取两者协调、均衡和良性地运行，觅求两者的最佳结合点。集权、分权也不是单行道，两者的“双向运行”是开掘社会主义制度巨大潜力的结构保证，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活力

的工作母机。关键是计量两者的控制尺度。苏维埃国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本质上构造了当代世界有关微观灵活与宏观控制的框架，并展现了未来世界的先导性蓝图。这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十月革命的创造力和苏维埃俄国的初期实践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母体，斯大林体制的危机现象滋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腐败是机制变革的引发力，而赫鲁晓夫的创造性变革精神则为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和根本性改革拉开了政治帷幕。戈尔巴乔夫则是苏联历史的产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北高加索赤卫队区普利沃尔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读高中时，经常利用假期到当地农田干活，是联合收割机手。戈尔巴乔夫呱呱坠地之时，正值苏联农村政策大转折翻动起来的阶级斗争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显然，事出有因。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工业方面实行租让制、租借制，以及各种租赁办法；农业方面实行粮食税、合作社制，以及各种包产到组，甚至实行个人承包的方式；允许私人经商，发展商品流通等。新经济政策把全国搞活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取得了颇为明显的成就，成为苏联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党内生活方面成为苏共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社会生机勃勃，人们思想高度活跃，其基点是新经济政策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最富有创造力的广阔空间，它在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扩展了十月革命爆发出来的巨大创造

力。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是一个飞腾的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活力来自开始激发商品经济的特殊效能，它的突出贡献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因此新经济政策是经济思维上的一次革命，首次提出了建立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全部创造活力的经济机制，社会创造力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是，商品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如不加以科学地制约和引导也是很危险的。尽管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但它在实施过程中失误、失策、失控，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端，诸如农村阶级分化严重、社会波动幅度大、工人失业比例高、思想战线极度混乱，社会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荡主义，社会病灶有诸多表现。症结在于国家以微观灵活求索经济效益时，在宏观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全局没有进行有效地控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新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并且通过调整也可以解决的。然而斯大林基于权能的目标，着力膨胀问题的阶级属性，进而用政治冲击的方式推行集中化和集权化，每3至5年出现一次社会振荡，甚至导出肃反扩大化。戈尔巴乔夫的摇篮是靠阶级斗争风暴摇动的。

1950年，戈尔巴乔夫进入国立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他回到故乡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和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70年，他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代表。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当选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即他49岁那一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同前几任相比，他是最年轻的苏共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动荡中出生，在阶级斗争风暴中成长，亲身体察了斯大林体制的严重弊端。特别是单一纵向垂直结构是官僚主义膨胀的温床。这种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更多的是磨灭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堵塞了社会主义民主通道，全方位地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创造锋芒。物质和思维的贫穷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当代世界映象的基本特征。

上述演化显示，无论是失控的市场机制，还是单一的计划机制，都偏离了经济社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而没有开掘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脱钩，显然不能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斯大林体制所取得的成果为否定这一体制准备了条件，由此导出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直观体察了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严重官僚主义的危害，未经细密权衡便使改革出台。他的改革是失败的，造成国民经济的高度混乱。然而赫鲁晓夫开掘了苏联改革的潜流，揭开了政治改革的帷幕。他用不慎重和东奔西突的办法，一度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激情和希望。但他仅是在原体制大院内转一圈，以一种行政指令代替另一种行政指令。经过令人激愤的小迂回，他自己也回到了个人崇拜的老路，人民群众的激情一闪而失。热衷于权力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虽几经改革，但他主要是用集中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并排斥市场调节作用。他在人们的沉闷中在原体制的庭院内又来个迂回。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塑成偶像，公民思维僵化，官僚主义成风，社会沉浸在腐败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对一个庭院里的两次惊人的小迂回不

仅历历在目，而且还有切肤之痛。

面对着新技术革命的紧迫而尖锐的挑战，商品经济紧迫地扣响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大门。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开始为改革注入活力，他提出要对苏联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即进行第二次革命。

雄心勃勃的戈尔巴乔夫面对着苏联半个多世纪历史压缩成的难题。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51—1955年平均增长13.1%，1956—1960年下降到10.4%，1961—1965年下降到8.6%，1970—1975年下降到4.4%，1981—1982年则降到2.2%。斯大林“损”农业，越损农业越糟；赫鲁晓夫“轰”农业，越轰农业经营越粗放；勃列日涅夫“买”农业，越买农业投资效率越低。此相伴的是某些危机和腐败现象在社会中日渐滋生。

经济潜伏着的险情显示，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的整体效能已穷临谷底。中经两次小迂回，传统模式下凝聚的巨大潜力很可能强劲地弹出一个大转折，戈尔巴乔夫借此决意在实质上回折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即在经济社会机制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政治是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与前两次小迂回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列宁主义旗帜下，借助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社会主义自治和公开化原则等，首先在整体上激发社会活力。起点是激活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思维、各级干部到人民大众中去创造。着力于激励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复现十月革命那种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对僵化的经济社会实施第二次政治突破。首先在全局上激发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力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战略基点，并在思维上寻求

解冻思想僵化的突破口，在这一点上高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目前改革适当抑制传统商品经济，科学制导和引发现代商品经济的巨大效能，重在城市工业部门开改革之口。控制改革进程，把国家的稳定和巩固世界大国地位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这些是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的醒目之点。

从国际战略视野检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向尤其令人格外注目。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在战略上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运筹经济社会的战略取向是面向21世纪的客观要求。国际社会主导性的战略流程依次是军事战、经济战和智能战。国际战略的三大战略程序列在宏观上表达了时代性的战略要求。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在实质上站到了时代的高度，顺应了经济战的走势，使苏维埃俄国与当时世界先导方向接轨。但在30年代以后，尽管苏联在策略上一时顺应了国际战略总流向的暂时倒流趋势，但在全局上却与国际战略总流向作反向运行。由于在实际上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在30年代延误了经济战的起步。从实质上看，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是个军事内涵性结构，其政治经济结构更多的是适应军事战的要求。50年代初期前后，苏联猛烈地批判新兴科学，使苏联错过了关键性的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最佳结合点，致使智能战在苏联姗姗来迟。如今，苏联庞大的军事战机体早已运转不灵，经济战急促地扣响了苏联的国门，智能战强劲地捲挟着苏联的取向。因此，戈尔巴乔夫决计为苏联寻求战略变位，使其以新的生机，面向未来世界。

改革充满着风险。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抽取、榨干的农村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又是在前几届领导人在农业上无所

作为情况下急速晋升的，至今他本人也无良策可施。农业是现代大国的主导型经济，也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指标。它仍然是苏联的一个难题。当然，苏联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干部队伍和传统势力，其标志是3,075名区委书记的向背。当然风险中也有机会，全面改革终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戈尔巴乔夫一脚踏在停滞的社会里，一脚要迈向飞腾的新世界，一个人处在历史的交错点上，当然会被人们长期的关注。

作为中国人更加潜闻于戈尔巴乔夫的现实脚步声。校友邹明、刘海涛、郭强在长春期间勤于学业，如今在北京工作潜心研究。他们忙中偷闲，把《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一书译成中文，又承沈阳出版社颇具慧眼，把该书出版。我作为一个苏联事务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工作和奉献是由衷感谢的。如果读者能从这本书领悟到某些启迪，首先应感谢该书作者，同时也是对译者和出版者的最高奖赏。我希望这本在美国的畅销书，也能在我国有相应的反响。

王家福

1988年6月28日于吉林大学

王家福：吉林大学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理事、苏联研究所国际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导 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从而取得最高权力之后，迅即做出一项象征性选择。他把1986年2月25日定为苏共二十七大大开幕之日。2月25日在苏联历史上有特殊意义。正是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尼基塔·赫鲁晓夫向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太林的罪行。

斯大林的大恐怖终于正式遭到谴责。但是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即秘密报告的标题）的揭露，后人只记住了“个人崇拜”，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行政“后果”却被悄然忽略了，并且羞羞答答地掩饰起来，直至如今。

戈尔巴乔夫寻求实现的社会转变是非斯大林化的第二步。赫鲁晓夫仓猝上阵，单枪匹马与斯大林的幽灵交锋。三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则试图以周密的计划向斯大林的遗产——苏联墨守成规的集权经济体制发动大举进攻。

赫鲁晓夫踏上了疆场，与威胁人们生存的恐怖行为作战，戈尔巴乔夫则指挥着反对更阴险的毁灭形式的战役：反酗酒、反腐败、反无效率；赫鲁晓夫企图消灭斯大林的党羽：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使官僚体制合理些；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则在于更换整个一代人，迫使同一官僚体制的变革进行到底。

尽管赫鲁晓夫拥有一切权力，但他仍是一副村民形象，

尽管他的设想荒诞无稽，而他的共产主义却充满朝气。他象民粹主义者那样那呼吁无产阶级。戈尔巴乔夫也是民粹主义者，但他更加深思熟虑、谨小慎微。如果说他比赫鲁晓夫更勇敢的话，那末他也比后者更冷静；如果说他更精于算计的话，那末他也更有预见性。赫鲁晓夫在哪儿都象个乡下佬那样喜欢炫耀自己，以世界革命的空洞要求模仿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而戈尔巴乔夫则希望作为引人关注的政治家出现，呼吁全球的伙伴，面向列宁，面向后来的列宁，面向真正政治家的列宁，使其改革纲领合法化。

戈尔巴乔夫选择的事业使许多观察家深为惊讶困惑。但人们对他的选择并非无所预见。

从70年代中期至今，苏联上层社会对改革萌发了向往之情。那时，我作为记者驻在莫斯科，一条意想不到的鸿沟在我眼前裂开了。一方面，在正式招待会上和每日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我看见一批背时的党的领导人，仍固守一种不现实的世界观，通过彼此互授勋章，补偿他们日益减小的权限。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在企业、机关、图书馆里，我会见了上层社会的少壮派，他们好奇地、不带偏见地、非教条地并带着学习意愿看待这个世界。

这些年轻人并非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既不过度崇拜西方也不谴责社会主义。他们不属任何特定营垒。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信徒，但也不憎恨这一学说。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希望以此提高生活水准，实现一种更好、更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虽然他们不把这种变革寄希望于保守派，即那些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变得老朽的官僚和行政人员，虽然

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一代新型领导人的能力，但他们并非玩世不恭，这使我相信苏联积蓄了大批人才，他们在等待着被用来进行更为人道世界的创造。

正是安德罗波夫首先开始发掘了这些人才储备，伴随着大多数群众对“强人”模糊地渴望，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开展了两大运动：首先是反腐败运动（虽然向腐败现象的进攻与其说是使之消除，还不如说是一种夺权的手段），然后是争取更有效率的社会体制运动。也正是安德罗波夫，在患病期间，推举出一个人物，他相信，此人能担负起较为年轻一代人的希望，此人便是戈尔巴乔夫。这位来自北高加索的新手，1978年便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时年仅47岁，又在50岁生日之前成为一名政治局委员。

这个转变在苏联史无前例。本书叙述了转变如何发生，考察了它为苏联及其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欧美关系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机会。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和平与理性有新的转机吗？对和平的渴望能克服军备纲领的重负和苏美国防工业的影响吗？如果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确立的人类联系能共同遵循的话，如果他们的新年祝贺的热情意味着什么的话，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间在1985年最初几个月涌出的裁军建议洪流有什么实质性的话，那末答案有资格是肯定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攻势并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表现，它是国内改革所必需的国际结果。戈尔巴乔夫如想使国家进步，就必须保证外部和平。两方面都存在许多危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许会发生摇摆，就象赫鲁晓夫那样——俄国

的历史教训就在于，对任何领导人来说，将其意志强加于这样一个庞大消沉的社会之上是非常艰难的。万一那样，其和平攻势后面的理论基础就会土崩瓦解。或者大西洋联盟，因其成员利益在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问题上发生分歧，也许会转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策略，迫使他重整军备，威胁他的改革计划。这两个问题，即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和世界安全问题，从前还从未这样密切相联。现在，西方必须为这两个问题分担责任，即便前无先例。

目 录

导 言

- | | | |
|-----|------------|---------|
| 第一章 | 红星升起 | (1) |
| 第二章 | 历史重负 | (19) |
| 第三章 | 成功阶梯 | (39) |
| 第四章 | 新旧之争 | (63) |
| 第五章 | 转折年月 | (79) |
| 第六章 | 二号人物 | (94) |
| 第七章 | 大权在握 | (110) |
| 第八章 | 西望欧美 | (141) |
| 附录一 | 经济改革前景 | (171) |
| 附录二 | 戈尔巴乔夫的一套人马 | (192) |

第一章 红星升起

1984年12月15日。星期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对西方公众仍还陌生的人物，率领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到达伦敦，他们是作为英国下院的客人来进行例行性互访的。当时，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最高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然而人们感到这次访问已超过了其官方目的，预示着更重大的意义。戈尔巴乔夫除了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外，还是年纪衰老，疾病缠身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显而易见的接班人。这次访问是自1967年柯西金总理访问伦敦以来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的首次来访，因此戈尔巴乔夫的一言一行都将被视为洞察苏联未来新一代年轻领导人的参照物。他将成为另一位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一位20年前统治苏联的那些元老们年轻的化身吗？他的崛起标志着苏联与旧时代真正的决裂吗？

戈尔巴乔夫12月中旬的伦敦之行确实表现了与其前任的不同之处。他衣冠楚楚，身穿带条纹的灰色西装，头戴软毡帽，象任何一位西欧国会议员一样，显得悠闲自得。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现象而已。那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参观了英国博物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但这足以检验他的反应能力。40多名示威者拖着长声喊叫：“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在哪儿？”（萨哈罗夫是被流放的